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88—1689

# 英国革命

## 1688—1689

[英] G.M. 屈威廉 著

宋晓东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88—1689

# 英国革命

## 1688—1689

[英] G.M. 屈威廉 著

宋晓东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革命:1688—1689/(英)G. M. 屈威廉著;宋晓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2804-9

I. ①英… II. ①G…②宋… III. ①英国资产阶级  
革命 IV. ①K56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196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英国革命

1688—1689

〔英〕G. M. 屈威廉 著

宋晓东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804-9

---

2017年4月第1版

开本780×960 1/16

201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0½

定价:26.00元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88—1689**

据伦敦桑顿·巴特沃斯出版有限公司 1938 年版译出

## 译者前言

《英国革命 1688—1689》(*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88—1689*)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该书共分八章,主要介绍的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史学界公认,正是通过“光荣革命”,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因此,这次革命在英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位著名的辉格—自由主义史学家,屈维廉对“光荣革命”的解释基本上代表了现代英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乔治·麦考莱·屈维廉是 20 世纪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出身名门,一生勤耕不辍,可谓著述等身,获得了无数的荣誉。1927 年,他成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因为其在史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他还成为了英国功绩勋章的获得者,一生可谓备极荣宠。他的许多史学著作也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推崇。我国著名学者钱端升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就将他于 1926 年出版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翻译成了中文,认为“屈勒味林的《英国史》一出版而最佳单本历史之誉便舍它莫属”,对屈维廉,钱端升则称之为“英史中之时者”,可谓

推崇备至。<sup>①</sup>

屈维廉是 19 世纪著名辉格派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外孙,从某种程度上也是麦考莱史学传统和政治观点的继承者。自近代以来,英国的史学界就像政界一样存在着两大流派,托利-保守学派和辉格-自由学派。随着自由主义的迅猛发展,到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英国史学界,许多托利党的观点已经让位于辉格-自由党的观念。麦考莱就是这一时期辉格党最出色的史学家和政治上的代言人。麦考莱鼓吹自由主义,反对君主专制,反对陈腐的君权神授观念,但他也坚决地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他在其历史著作中宣称,英国的全部经验表明,摒弃革命不仅是可能的也是适当的。他在 1828 年写道:“我们还不知道有一次绝对不能以及时的友好妥协来预防的革命。”他指出:“温和的让步可以纠正一切,调整一切,保持一切。”通过对比英国和法国的历史,麦考莱更加确信,英国是各国人民最优良的范例。他在 1852 年 11 月 2 日发表的议会演说中指出,英国在 1848 年之所以没有发生革命,英国人之所以拥护他们的政府,是因为:

“我们知道,我们的政府虽然不是个十全十美的政府,却是个好政府,它的弊病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和合法方式加以改正;它从来没有断然拒绝过正当的要求,我们得到了无比可贵的让步,其办法不是靠擂鼓,不是靠鸣钟,不是靠毁路筑障,不是靠奔向铁匠铺操刀拿枪,而只是依靠理智和舆论的力量。”<sup>②</sup>

基于此,1688 年的“光荣革命”自然也就成为了麦考莱竭力赞扬歌颂的历史事件,用恩格斯的话说,“光荣革命”在麦考莱笔下成

<sup>①</sup> 屈勒味林(旧译):《英国史》,钱端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译者序第 2 页。

<sup>②</sup> 拉尔夫·密利本德:《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博铨、向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27 页。

了“世界上存在的最出色的事件”。

作为麦考莱的外孙，和 20 世纪初英国学术界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屈维廉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并且发展了麦考莱的观点。在屈维廉的著作中，渐进的变革始终是他竭力赞颂的观点。他指出：“英格兰的议会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既不是西蒙也不是爱德华，它是逐渐长成的，而不是一朝造成的。英格兰人民因为具有健全的常识和善良的本性，一向都是喜欢委员制而厌恶独裁制，要选举而不要巷战，要谈话的酒馆而不要革命的法庭。”<sup>①</sup>

屈维廉和麦考莱一样，也给予了“光荣革命”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光荣革命’不仅是英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此，《英国革命 1688—1689》一书，虽然相较于屈维廉的其他许多大作显得篇幅较小，但更加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念。屈维廉将“光荣革命”称之为“历史上最具有英国特色的东西”，因为“它建立在明智、妥协和宽容的基础上”（原书第 37 页）。

和麦考莱一样，屈维廉对暴力色彩浓重的英国内战和法国大革命也采取了贬斥的态度。他指出：“这次革命（1688 年光荣革命）值得赞赏的地方不在于歇斯底里的吼叫和骚动，而在于冷静、谨慎、智慧的小声细语，这些胜过了所有的喧闹声。”屈维廉认为，这次革命的真正“光荣”之所在，并不是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只使用了最低限度的暴力，而是在于，“这次革命的解决方法为后世的英格兰人民找到了一个避免使用暴力的办法”（原书第 9 页）。

毫无疑问，麦考莱和屈维廉的历史观点有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一味否认或贬低暴力革命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即使是在英国历史的发展中，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屈维廉自己

---

<sup>①</sup> 屈维廉：《英国史概要》（*Illustrated History of England*），伦敦，1956 年，第 178 页。

在书中也承认,正是由于对再次爆发内战的恐惧,才迫使绝大多数英格兰人,包括曾经势不两立的两大敌对政党联合起来完成了一次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对此他引用了一句英国的古老谚语:被烧伤过的孩子害怕火。

屈维廉和麦考莱对“光荣革命”的颂扬自然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纵观英国的发展道路,不得不承认,渐进的改革相较于暴力革命占据了主流。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历史也较少血腥暴力的色彩。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张君勱先生就曾经说过,学政治(学),要在英国,学哲学,要在德国。因为政治的要义就在于妥协,对立双方能够在必要时做出明智的让步。

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英国这种和平渐变的发展模式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肯定。和平改革相较于暴力革命毕竟会少付出许多代价,人民也不必承担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和牺牲。但“告别革命”并非易事,改革的道路也并不容易走得通。特别是在那些革命已成为习惯,缺乏谈判和妥协传统的国家,变革往往是以改革开头,以暴力冲突结尾,不杀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就难以分出胜负,最终还是回到了暴力革命的老路上。因此,像“光荣革命”这样“不流血的革命”的确并不容易做到。英国历史上,像“光荣革命”这样的例子也并非罕见,从中世纪议会制度、普通法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到19世纪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议会改革,我们都可以看到那种冲突与变革在发展中相融合的英国模式。因此,作为一种成熟而且成功的发展模式,英国的发展道路的确有许多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要学习,就要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认真的个案分析,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作为一个“最具有英国特色”的案例,屈维廉对光荣革命的分析 and 总结有许多独到之处。例如,他在分析“光荣革命”的影响时指出,“光荣革命”不仅确立了议会占主导地位的君主立宪制,更重要的是,它还为英格兰的宗教宽容和司法独立奠定了基



础,而这两项成果对现代社会的建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宗教宽容是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前提条件,而司法独立则是建设一个法治社会的基础。

“这种宽容和尊重法律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在‘光荣革命’后的一百年间深深地渗入了英格兰人的心灵之中,当新时代的压力——民主运动、法国革命、巨大的产业变革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来临的时候,这种习惯产生了作用。……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受害者在为他们所受伤害寻求补救方法的时候,他们要求的是选举权和议会改革,而不是推翻整个制度。这种令人高兴的选择,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民族特性,但更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国家制度,它使被压迫者看到了一条躲避灾害的途径。‘光荣革命’从根本上挽救了王权和其他很多东西。”(原书第244页)

另外一个需要提到的地方就是屈维廉的文风。屈维廉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麦考莱的政治观点,而且其叙事风格和文笔也深受麦考莱的影响,两者都是文笔优美,叙事生动。麦考莱希望他的历史著作即使在少妇眼中,也能和最时髦的小说竞争。屈维廉则认为他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使自己所写的一切东西能使广大读者感到有趣,两人都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钱端升先生在评价屈维廉的《英国史》一书之所以被世人所推崇时,总结了四点主要原因:一是范围的广大;二是材料的宏博;三为文笔的卓绝;四为涵义的深长。他认为屈维廉的著作中,“流畅的叙述,生动的摹绘及深刻的论评无一或缺”。

事实上,这些评价几乎可以应用到屈维廉所有的著作中。例如本书中屈维廉在总结“光荣革命”前后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区别时,用了一句简短,但很精辟的评论:“1689年的‘革命解决方法’不是哪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一个协议:自己活,也让别人活(to live and let to live)。”一句话道出了英国现代两党制的精髓。

屈维廉的文风与其所信奉的历史哲学是密不可分的,和麦考莱一样,屈维廉也认为历史的价值应该首先是其教育价值。屈维廉在 1913 年出版的《历史女神》一书中论证了自己所理解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任务。他反对将历史学完全科学化、实证化,反对专家垄断历史研究,认为历史应该是英国民族文学的一部分,而把历史当作科学的想法,是与把研究成果以吸引人的形式传达给广大民众的英国旧理想相矛盾的。他指出,史料本身永远不能说明我们想知道的一切,因为想象对揭示古人行为的原因是异常重要的。屈维廉宣称,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有三项任务:首先是学术的任务;其次是使自己的想象自由的任务;最后是文学的任务。屈维廉断言,“历史就是故事”,它的“最后的价值……不是科学价值,而是教育价值”。<sup>①</sup>

屈维廉关于历史学的思想是对 19 世纪后期盛行的科学万能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一个有力反动,对英国 20 世纪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屈维廉反对把历史当作科学,并不是说他不注重史料的客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相反,他的治史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他反对的只是打着科学的旗帜将历史学教条化、程式化的错误做法,从而使历史学失去群众基础和生命力。这些对于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有着很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屈维廉本人及其历史著作在中国备受冷落。虽然他的著作在国际历史学界影响很大,但被翻译成中文的只有 1926 年出版的《英国史》一书,而且还是钱端升先生早在 1931 年翻译的,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英国历史的了解。英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国情与我国有着很大的差别,在研究英国史时,中国学者与英国学者之间在看待问题的方式上还是存在着

---

<sup>①</sup> K. E. 维诺格拉多夫:《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何清新译,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77页。

不小的分歧。作为一位深受自由主义和英国历史文化浸润的知名学者，屈维廉的许多观点我们未必会认同，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

屈维廉学识渊博，著作丰富，笔者只是想借本书中译本出版之际，希望能唤起学术界的注意，将这位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的作品，能够更多地在我国翻译出版，填补我国英国史、世界史研究中一些空缺，也使我国广大的普通读者更好地了解英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建设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我们的确可以从英国的历史中借鉴到许多经验。

笔者在翻译过程中，幸蒙商务印书馆杜廷广编辑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深表谢意。译文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和行家指正。

宋晓东

2015年1月

#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查理二世的统治	9
第三章	詹姆斯二世的统治	23
第四章	革命	52
第五章	革命解决方法	74
第六章	革命解决方法的持久与发展	98
第七章	革命解决方法在苏格兰和爱尔兰	113
第八章	结语	135
	参考文献	139
	索引	143

## 第一章 导言

7

为什么历史学家们认为 1688 年革命重要呢？它配得上“光荣”——这个长久以来与众不同的称号吗？“明智的革命”也许会是一个更合适的名称，能够更清楚地彰显它和其他革命的不同之处。

不过即便这次革命的确是“光荣”的，其光荣之处又在何处呢？它不是那种拿破仑式的光荣。这种光荣也与那种浪漫和戏剧性的场面、参与者的英雄主义行为无关，虽然这些也确实激发了人们的想象，使人们热血沸腾。七位主教穿过道路两旁跪下的民众走向伦敦塔；威廉的舰队 in 清教之风中驶入托湾；詹姆斯二世，跟随着他的妻儿，逃亡到了法国，再也没有回来——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事件。接下来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发生的那些事件更具有血腥味儿——克力克兰基战场上两军的怒吼，伦敦德里城墙上拼死的搏斗，波因河上呼啸的滑膛枪和长矛。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像巴士底狱的陷落或者拿破仑的帝国，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恐怖的诞生。它们是那些四十年前就被提出来的问题，在更英勇、更大胆、更具有创造力的一代人手中，得到不同于以往、更有创新性的解决。

8

与当年查理一世试图逮捕的五名议员相比，詹姆斯二世起诉的七名主教更温和、更保守。但是第二个故事读起来更像是第一

个故事的重复：在这两次事件中国王都鲁莽地攻击受到法律保护  
和首都群众舆论支持的民众领袖。在这两次事件中国王都很快  
下了台。当然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在第二次事件中，没有爆发内战，  
因为在 1688 年甚至骑士党人（后来命名为托利党）也反对国王。  
但是这次革命中的人们，詹姆斯和威廉、丹比、哈利法克斯、桑克  
罗夫特、邓迪，他们所利用的力量、党派和思想观点，都是当年劳  
德、斯特拉福德、皮姆、汉普登、海德、克伦威尔、鲁伯特、弥  
尔顿等人首先利用或提出来的。在后面的这次革命中并没有什么  
新的思想观念，因为即使是宗教宽容这样的观念，在当年克伦威  
尔的军营中也早已被热烈地讨论过了。但是在 1688 年，通过妥  
协、折中、宽容，从旧的党派中产生了新的组合，在老的问题上  
产生了新的、令人高兴的思想转变，虽然这种转变只是在英格兰  
而不包括爱尔兰。在一个英雄的时代问题被提了出来，经过了一个  
理性的时代问题得到了解决。狂热的圆颅党人和骑士党人开垦了  
土地，冷静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则收获了果实。

诸多理想的破灭使人们变得清醒，到 1688 年，人们经历了双  
重的幻灭感，先是克伦威尔圣人式的统治，然后是詹姆斯君权神  
授式的统治。但不管怎样，过去的经历已经使人们畏惧再一次的  
内战。俗话说：被烧伤过的孩子害怕火。这次革命值得赞赏的地  
方不在于歇斯底里的吼叫和骚动，而在于冷静、谨慎、智慧的悄  
声细语，这些胜过了所有的喧闹声。

这次革命的真正“光荣”之所在，并不是为了保证它的成功只  
使用了最低限度的暴力，而是在于，这次革命的解决方法为后世的  
英格兰人民找到了一个避免使用暴力的办法。先人们在外国军队  
的帮助下，战胜了一个头脑糊涂的国王，因为他迫使他的十分之  
九的臣民都不得不在法律、政治和宗教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起来  
反对他，这种胜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光荣之处。在双方力量如此  
对等的情况下，如果祖辈们失败了那才真正是整个民族的耻辱。

在这场短暂的、未流血的革命中，光荣属于威廉而非英格兰人。威廉制定了详尽而周密的计划，不惮风险跨海远征，英格兰人所做的只是在威廉和他的军队登陆时万众一心地举帽欢呼而已。

但是对于英格兰来说，也有着真正的光荣：在詹姆斯二世被推翻的政治巨变中，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刑场上，都没有流下英格兰人的鲜血。虽然爆发内战的各种因素都已具备，但英格兰人民的政治天赋使得他们避免了又一次的内战。他们的敌人、法国的路易十四确信，如果威廉在英格兰登陆，这个党派分立的岛国将会再一次陷入长时间的混乱和争斗之中。否则，他本来可以出兵威胁荷兰边境，阻止威廉的跨海远征。

但是在1689年2月召开的议会大会，将英格兰人民团结起来，阻止了法国的企图。通过明智的相互妥协，当年圆颅党人和骑士党人、国教徒和清教徒之间，先是在艾芝西尔和纳斯比，四年后又是在塞奇摩尔结下的血海深仇终于得到了化解。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在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詹姆斯二世的过程中，抓住了这个转瞬即逝的联合起来的机会，共同缔造了一个新旧参半的政体，这就是后来历史上称之为的“革命解决方法”(Revolution Settlement)。\* 在这种政体形式下，英格兰从此得以享受和平。不管对于教会还是国家，这个“革命解决办法”都证明具有稳固的特质，它几乎没有变动地一直维持到了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通过。在接下来的19世纪和20世纪里，社会发生了迅猛的变化，但“光荣革命”所缔造的宪政基础依然支撑起了越来越民主化、越来越庞大的上层建筑。从长远看，这就是光荣革命的“光荣”，它不间断地燃烧了二百五十年，它不是那种凶猛的、短暂的、具有摧毁性的火焰。

詹姆斯二世的被驱逐的确是一个革命性的行动，但是这次革

---

\* “Revolution Settlement”一词在汉语中很难找到很准确的、对应的翻译。钱端升先生在翻译屈维廉的《英国史》一书时，将其翻译为“革命解决”。也有人将其翻译为“革命的安排”。似乎都未能尽达其意。这里暂且译为“革命解决方法”。——译者

命的精神却完全是与革命“背道而驰”的。这个革命不是要推翻法律，而是要维护法律，反对一个破坏法律的国王。这个革命不是要在政治上或宗教上迫使人们必须去服从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给予了他们法律之下的自由。这次革命既是自由的又是保守的，而大多数革命则两者都不是，它们所做的就是推翻法律，然后除了一种意识形态外绝不容忍其他的存在。但是在这次革命中，教会和国家的两大政党联合起来，从詹姆斯二世的手中拯救了这个国家的法律。革命成功后，在 1689 年 2 月共同和分别成为时局的主宰者之后，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不会再容许自己的民众遭受迫害，不管这种迫害来自于君主还是反对党。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解决方法”的要旨就是法律之下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既是宗教方面的，也是政治方面的。历史上的所有革命之中，最保守的革命往往也是最自由和最开明的。假使詹姆斯只是被辉格党或托利党单独推翻的，在他倒台后随之而来的这个解决办法就不会如此开明，或者如此长久存在了。<sup>①</sup>

在思想和宗教领域，个人自由的获得是通过放弃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坚守的信条，即：一个国家内所有的人民都必须是国教的一名成员。1689 年的《宽容法案》给予了非国教徒宗教信仰的权利，虽然他们在政治上还没有得到完全平等的权利。由这次革命开启的这个时代的宗教自由和宽容精神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这种权利很快就扩展到了那些罗马天主教徒，虽然这只是在实际生活中，并未得到法律上的真正认可。而从某方面说，天主教徒就是这次革命所针对的目标。

13 在这样一个相似的时代精神下，个人的政治自由逐渐确立起

---

<sup>①</sup> 导言里所指的只是英格兰。在苏格兰，1688 年冬天的那场革命主要是由长老会教徒和辉格党人主导的，圣公会教徒没有提供多少帮助，因此苏格兰的 1689 年革命解决方法只是长老会教徒一方制定的。其结果就是在苏格兰连绵不断的内战，直到 1746 年。在爱尔兰，革命解决方法是一个最野蛮的、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再征服。



来。1695年出版审查制度被废除,法官在政治问题的处理上更加温和和公正,更重要的是辉格党和托利党在政治上的权力制衡,在双方相互对抗的旗帜下,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以某种方式找到庇护。通过这些方式,英国人那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关于言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观念,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都要归功于这次革命与众不同的特色。

詹姆斯试图将国王置于议会和法律之上。这次革命,虽然将行政权留给了国王,但却将他置于了法律控制之下。从此以后法律是由独立的、国王不能撤换的法官解释的,并且只能根据议会法案更改。同时,议会通过每年的《兵变法》,使得军队不得不依赖于议会存在。议会下院通过拒绝一次性给予威廉终生的财政拨款,从而获得了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权力,并使得自己的地位变得比上院更加重要,而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都曾经获得过这种终生的财政拨款。事实上,在“光荣革命”以后,下院逐渐获得了对国王行政权的控制,这种控制是通过在威廉、安妮、前两个乔治国王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内阁制度获得的。所有这一切,1689年时的人们都没有预料到,他们的目标就是将国王的权力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而这些法律则是由那些倾向于议会的律师做出解释。但是在沃尔波尔和彼得父子任首相时期,汉诺威王朝的宪政体制,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径直超出了革命解决方法之外。

这次革命一直被认为是一次贵族性的革命。事实上,是全国人民、所有的阶级联合起来促成了这次革命。但是在一个仍然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不管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结构,都使地主们成为了农民的天然首长。当需要起来反抗政府时,那些贵族和乡绅,例如托利党的丹比勋爵和西摩尔勋爵,辉格党的德文勋爵和什鲁斯伯里勋爵,就承担起了领导的责任。当这个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除了他们没有其他人可以担当起领导的责任。内战伊始,圆颅党和骑士党的军队都是由同一个阶级——贵族地主阶级组织起来